

# 顧長康著述考

莊 申

顧愷之，字長康，是晉末著名的畫家。他主要的著作，原名《顧愷之集》。據《隋書》，本有七卷，惜早失傳。清末的嚴可均，在他所編的《全晉文》裏，搜集了顧愷之在文學方面的作品十六篇。此外，唐末的張彥遠，在他所編的《歷代名畫記》裏，也搜集了顧愷之的三篇論藝之作。不過根據內容與性質，嚴可均搜到的《王衍畫贊》，似乎應該是由張彥遠搜到的《魏晉勝流畫贊》裏的一部份。本文根據《隋書》所記的卷數，把由張、嚴兩家所搜集到的十幾篇文字，分爲七卷。這樣，已失傳的《顧愷之集》也許可以恢復一部份原有的面目。

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據《晉書》的顧氏本傳，是《啟蒙記》。可是在《三國志》所引用的資料裏，卻把它記爲《啟蒙注》。此外，《隋書》又把它記爲《啟蒙記》。據《隋書》的記載，顧愷之還有一種著作叫作《啟疑記》。在這四種不同的書名之中，作者認爲《啟蒙記》才應該是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因爲用「啟蒙」爲名，一方爲是由於此書所記的奇異事物，荒誕不經，閱後既可以使人具有大開眼界之感，一方面可能也與顧愷之的詼諧的個性有關。他用「啟蒙」爲名，似乎含有和讀者開一次玩笑的意味。《新唐書》的編寫，雖受史家的推崇，可是歐陽修在提到顧愷之的這種著作的時候，只把它簡稱爲《啟蒙》，而不說明他所看到的，是《啟蒙注》還是《啟蒙記》。這種曖昧的態度，間接說明連他也不知道此書的正確名稱是什麼。

除了《啟蒙記》，顧愷之還有一種叫做《晉文章記》的著作。這本書專門討論晉代文學風格，性質很像是文學批評。可惜此書目前只存十餘字，不能仔細討論了。

由這三種性質與內容都不同的著作，可以看出顧愷之的寫作能力既強，寫作的興趣也很廣。這與他在藝術方面，既能從事繪畫的創作，又能撰寫論畫文字的多元發展，是一致的。《晉書》在顧氏本傳中認爲顧愷之是一個「才絕、畫絕、癡絕」的人物。大概「才絕」與「畫絕」，應該是指顧愷之在文學與藝術兩方面的多元發展而言的。

顧愷之（344-405），字長康，是一位在東晉末年生於江蘇無錫的名士與藝術家。在目前，在畫蹟能夠保存於世的許多古代藝術家之中，顧愷之恐怕是時代最早的一位。二十世紀的學術界，對於顧愷之的研究，雖然不少，不過這些研究，如果不是偏重於對顧愷之的畫蹟的討論<sup>1</sup>，就是對他的傳記<sup>2</sup>或畫論<sup>3</sup>的翻譯與討論。對顧愷之的

1 我國學者對於顧愷之研究的專著，大概是下列五種：

(1) 溫肇桐：《晉唐二大畫家》（民國三十四年，上海世界書局初版。後有一九六〇年及一九七〇年香港幸福出版社與崇明出版社的兩種翻印本）。顧愷之部份，共四十九頁，無圖版。

- (續)(2) 潘天壽：《顧愷之》(一九五八，上海人民美術出版初版。後有一九七九年之再版本)。全書共三十六頁，三十九圖版。此書後有一九七九年香港，中華書局的翻印本。
- (3) 馬采：《顧愷之研究》(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全書八十六頁，五十圖版。
- (4) 俞劍華、羅忞子、溫肇桐合編：《顧愷之研究資料》(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藝術出版社出版)。全書二三一頁，三十八圖版。
- (5) 溫肇桐：《顧愷之之新論》(一九八五年，四川美術出版社出版)。全書九十七頁，十六圖版。

我國學者對於顧愷之畫蹟研究的單篇論文，則有下列七種：

- (1) 于其灼：「顧愷之及其作品」，見《美術》創刊號(一九五四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2) 溫肇桐：「試論顧愷之的『女史箴圖卷』」，見《中國繪畫藝術》(一九五五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
- (3) 溫肇桐：「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卷』」，見《美術》第三期(一九五七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4) 唐蘭：「試論顧愷之的繪畫」，見《文物》第六期(一九六一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出版)。
- (5) 朱狄：「不負子建琳瑯筆，善攝詩情付丹青——洛神賦圖詩畫比較」，見《美術》第一期(一九六二年，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6) 沈以正：「顧愷之畫雲臺山記一文之研究(附復原圖)」，見《東西文化》，元月號(民國五十七年，臺北，中華學術院發行)，頁一五～二一。
- (7) 李霖燦：「顧愷之——其人其事其畫」，見《故宮季刊》，第七卷，第三期(民國六十二年，臺北，故宮博物院出版)。

此外，還有陳葆真女士在美國 Princeton University 以英文撰寫的，與顧愷之的畫蹟有關的一篇博士論文。不過到本文殺青，陳女士的英文論文，尚未得見。

在日本方面，與顧愷之畫蹟研究有關的專著，有下列三種：

- (1) 伊勢專一郎：《自顧愷之至荆浩之支那山水畫史》(一九三四年，京都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出版)。其第一章題曰「顧愷之」，共七十七頁，圖版六頁。傅抱石曾於此著作一書評，題曰「論顧愷之至荆浩之山水畫史問題」，見《東方雜誌》第三十二卷第十九號(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2) 梅澤如軒：《六朝時代の藝術》(一九二八年，東京，私人出版)。全書共一五六頁，分八章，附六十八圖版。書中與顧愷之有關係的部份，共有六章：
- |                 |                 |
|-----------------|-----------------|
| A. 第二章 顧愷之      | B. 第三章 張華の女史箴   |
| C. 第四章 顧愷之の女史箴圖 | D. 第五章 顧愷之の洛神賦圖 |
| E. 第六章 顧愷之の佛畫   | F. 第七章 古列女傳     |
- (3) 堂谷憲勇：《支那美術史論》(一九四四年，京都，桑名文星堂出版)。全書共三一頁，十六圖版。在此書內，與顧愷之有關的討論是以下兩篇：
- |              |               |
|--------------|---------------|
| A. 第一篇 顧愷之試論 | B. 第二篇 顧愷之の維摩 |
|--------------|---------------|

- 2 關於顧愷之的傳記，最早的兩種，都寫於唐代。房喬在《晉書》卷九十二為顧愷之所寫的傳記，現有三種學術性的譯本與一種非學術性譯本。現在把三種學術譯本，按照發表時間的先後，列舉如下：

- A. Ed. Chavannes: "Biographie de Kou K'ai-tche", "T'oung Pao", Serie II, Livr. 5, (1904, Leide), pp. 325-331.
- B. Arthur Waley: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ainting" (1923, London), pp. 45-48.
- C. Chen Shih-hsiang: "The Biography of Ku K'ai-chih" (1953, Berkeley)。此為美國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的 Chinese Dynastic Histories Translation 叢刊之第一種。譯文共三十一頁。

此外，橫川毅一郎在其《支那畫人傳》（一九一五，東京）中放有「顧愷之——才絕、畫絕、癡絕」一文。該文內容雖然也大致以《晉書》裏的《顧愷之傳》為依據，不過卻以小說的形式完成。這個譯本可以視為非學術性的譯本。橫川毅一郎的這篇文章，近年有莊伯和的中文譯本，見《中國畫人傳》（一九八六年，臺北，雄獅圖書公司出版），頁四七～七七。至於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卷五，對顧愷之所寫的傳記，現有四種譯本與一種校注本。茲分列如下：

- A. William Acker: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Vol. II (1974, Leiden), pp. 43-57.
- B. 小野勝年：《歷代名畫記》（一九三八年，東京，岩波書店出版）。
- C. 長廣敏雄：《歷代名畫記》（一九七七，東京，平凡社出版），上册，頁三一六～三三七。
- D. 近藤元粹：《歷代名畫記》（見螢雪軒叢書卷四。原書未見，出版時地不詳）。
- E. 谷口鐵雄：校本《歷代名畫記》（一九八一，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頁七～一七六。

- 3 關於顧愷之的畫論，他的「畫雲臺山記」共有四種英文譯本與兩種日文譯本，分列如下：

- A. Shio Sakanishi: "The Spirit of Brush" (1939, Landan), pp. 30-33.
- B. 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1962,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pp. 94-100. 在此譯本內，譯者將「畫雲臺山記」分為三十九條。
- C. Lin Yutang: "The Chinese Theory of Art" (1967, London), pp. 41-44.
- D. William Acker: "Some T'ang and Pre-T'ang Texts on Chinese Painting", Vol. II, (1974, Leiden), pp. 73-81.
- E. 小野勝年：《歷代名畫記》（一九三八年，東京，岩波書店出版），頁七〇～七四。
- F. 長廣敏雄：《歷代名畫記》（一九七七，東京，平凡社出版），上册，頁三三七～三六四。

對於這篇畫論有所討論的論文，則有以下數家：

- A. 伍蠡甫：「關於顧愷之『畫雲臺山記』」，見《談藝錄》（一九四七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頁一〇三～一〇八。
- B. 傅抱石：「晉顧愷之『畫雲臺山記』之研究」，見《中國古代山水畫史的研究》

畫論以外之著作的討論，幾乎是沒有的。<sup>4</sup> 本文的寫作，想就能在這方面，作一點整理與分析的工作。

《晉書》卷九十二在《顧愷之傳》裏的最後一句，是這麼寫的：

「年六十二，卒於官。所著文集及《啟矇記》，行於世。」<sup>5</sup>

根據這句話，顧愷之的著作，似乎有兩種；一種是他的文集，另一種是《啟矇記》。事實上，如以《晉書》別的篇章、以及《晉書》以外的資料作為證據，顧愷之的著作，並不祇限於這兩種。《晉書》在《顧愷之傳》中，對於顧愷之的著作的介紹，不但語焉不詳，也可說不是很負責任的。現在就按照《晉書》在《顧愷之傳》裏所提到的那兩種著作的順序，先討論顧愷之的文集，再討論《啟矇記》。最後才討論《晉書》所沒提到的，顧愷之的其他著作。

---

(續) (一九六〇，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

- C. 溫肇桐：「顧愷之『畫雲臺山記』試論」，見《文史哲》一九六二年，第四期（山東大學出版），頁四七～四九。
- D. 林同華：「論顧愷之及其繪畫美學思想」，見《中國美學史論集》（民國七十五年，臺北，丹青圖書公司重排本），頁六五～一〇五。
- E. 小林太市郎：「中國繪畫史論考」（一九四七年，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第二篇（支那畫の構圖よその理論）第三段（神仙山水の經營よ「畫雲臺山記」）。
- F. 米澤嘉圃：「顧愷之の畫雲臺山記」，見《中國繪畫史研究》（一九六二年，東京，平凡社出版）。此文現有宋紅之中文節譯本見《美術論集》第三輯（一九八三年，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
- G. 馬采：「顧愷之『畫雲臺山記』校釋」，見《中山大學學報》第三號（一九七九年，廣州，中山大學出版）。

此外，對於顧愷之的「魏晉勝流畫贊」與「論畫」等兩篇畫論的英文譯本，可見 Michael Sullivan: "The Birth of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 pp. 58-68, 以及 68-73.

4 有關顧愷之的著作的研究，現知只有下列兩種：

- A. 俞劍華、羅忞子、溫肇桐合編：《顧愷之研究資料》的第九節是「顧愷之文章輯錄」，見頁二一五～二二〇。
- B. 谷口鐵雄：「顧愷之の佚文」，見《美術史》第五十六號（一九六五年，東京，國立文化財研究所出版），頁一二〇～一三二。

5 見《晉書》（一九七四年，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九十二，頁二四〇六。

## 壹、顧愷之集

### 一、關於顧愷之集的討論

關於顧愷之的文集，《晉書》的《顧愷之傳》雖然沒有提到它的書名，不過在文獻上，卻可根據《隋書》，而知道這部文集的全名是《通直散騎常侍顧愷之集》<sup>6</sup>（以下此集簡稱《顧愷之集》）。如果用現代的觀念而講求出版資料，譬如此書是由什麼人編輯的、是在什麼時候初次刊行的、還有，這部書原來的篇幅如何，現在都不可知。不過，在梁（502-556）、隋（589-616）兩代，《顧愷之集》是有二〇卷的。可是到了唐代初年的貞觀十年（636）、此書已經只剩下七卷。<sup>7</sup> 顧愷之的卒年，大致是在晉安帝義熙元年（405）左右。<sup>8</sup> 如果就以他的卒年之次年（406）作為《顧愷之集》的

6 見《隋書》（一九七三年，北京，中華書局標點本）卷三十五，《經籍志》四，頁一〇七〇。在朝代的時間方面，晉（265-419）早於隋（589-617），但在史書的修纂方面，《隋書》修於貞觀十年（636），比修成於貞觀二十年（646）的《晉書》，早了十年。在一般情形之下，編寫較遲的書，常常有些資料，可以補充編寫較早的書籍之不足。《晉書》雖然成書稍遲，卻需要用成書稍早的《隋書》裏的資料，去補充它在編輯與資料兩方面的不足。這個史實既可說明房喬的史才不高，也成為史學上比較罕見的現象。

7 見《隋書》卷三十五，《經籍志》四，頁一〇七〇。但宋人鄭樵（1102~1160）在其《通志》（據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本）卷六十九「藝文志」七，於「別集」類，頁八一七，卻曾著錄過《通直常侍顧愷之集》十三卷。這個版本，後來未再有人提過。在數目上，二十是十三與七的總和。也許由鄭樵所著錄的十三卷本《顧愷之集》就是在唐初由魏徵在《隋書》所著錄的七卷本《顧愷之集》所失去的那十三卷。但是何以這十三卷要到宋代，才有著錄，現在還不能解釋。

除此以外，在清代，丁國鈞的《補晉書藝文志》，文廷式的《補晉書藝文志》，與黃逢元的《補晉書藝文志》，對於《顧愷之集》的著錄，都是二〇卷。這個數目，當然是指這部文集在未失傳以前的卷數。至於秦榮光的《補晉書藝文志》，雖把《顧愷之集》的卷數，記為三十卷，不過三十這個數目，顯然是二十的誤寫。

8 關於顧愷之的生卒年，現有六種不同的說法：

A. 姜亮夫：《歷代人物年里碑傳綜表》（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初版。後有一九六一年，香港，中華書局重印本），頁五十五，顧愷之生於晉成帝咸康七年辛丑，卒於晉安帝元興元年壬寅（341-402），年六十二歲。

B. 郭味渠《宋元明清書畫家年表》（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所附《晉唐五代重要書畫家年代表》，頁一，作生於晉穆帝永和二年丙午，卒於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346-407），年六十二歲。

C. 劉滄凌《唐代人物畫》（一九五八年，北京，古典藝術出版社）頁二，以為顧愷之

問世之年而開始計算，在從第五世紀初年到第七世紀初年的這兩百年內，顧愷之的文集，在卷數上，一直都是二〇卷。如果此書問世時，就是二〇卷，可以說，在這兩百年內，在篇幅上，《顧愷之集》一直沒有損失的。然而在從第七世紀初年到同世紀中期的這幾十年內，這部書的三分之二的篇幅，已經散失了。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散失得那麼快，真是令人痛惜的。到目前，連在唐代初年或第七世紀中期還能見到的，七卷本的《顧愷之集》，也已散佚不存了。

#### 1. 嚴可均搜輯到的文學作品

在清代中期，浙江學者嚴可均（1762-1843），從嘉慶十三年開始，直到道光十七年（1808-1838），前後用了三十年的時間，去努力搜集唐代以前各代的文章，然後他又獨自奮力，編成了一部篇幅共有七百四十卷的大書；書名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在此書中，與晉代的文章有關的《全晉文》部份，就有一百六十七卷。在《全晉文》的第一百三十五卷，嚴可均搜集到不少顧愷之的文章。各文的篇名是：

（一）雷電賦

（二）觀濤賦

（三）冰 賦

（四）湘中賦

（五）湘川賦

（六）策 賦

（七）鳳 賦

（八）四時詩

（九）拜員外散騎常侍表

---

（續） 生於晉穆帝永和二年丙午，卒於晉安帝義熙三年丁未（346-407），年六十二歲。

D. 潘天壽《顧愷之》（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以為顧愷之生於晉穆帝永和元年乙巳，卒於晉安帝義熙二年丙午（345-406），年六十二歲。

E. 馬采《顧愷之研究》（一九五八年，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以為顧愷之生於晉康帝建元二年甲辰，卒於晉義熙元年乙巳（344-405），年六十二。

F. 堂谷憲勇《支那美術史論》（一九四四年，京都，桑名文星堂出版），頁七〇《顧愷之年表》，以為顧愷之生於晉康帝建元元年（343），卒年不詳。

(一〇) 與殷仲堪牋

(一一) 虎丘山序

(一二) 嵇康贊序

(一三) 王衍畫贊

(一四) 水 贊

(一五) 父悅傳

(一六) 祭牙文

在來源方面，這十六篇文章，是由於得到晉代的，或者後代的著作的引用，才能夠保存下來的。一般的引文，在一般的情形之下，都不會很長。所以顧愷之的這十六篇文章，除了「雷電賦」，曾被引用了三百六十字（見附錄一），因此可說還頗具篇幅之外，其他各篇的長度，都很短。尤其是「湘中賦」，既然祇被引用了四個字，所以這篇賦，現在也祇剩下曾被引用的那四個字了（見附錄四）。漢代的司馬相如（179-117 B.C.）是有名的賦家。他的「梓桐山賦」，除了由顧野王（519-581）所編的《玉篇》引用了「礪礪」二字，已經完全失傳了。所以司馬相如的「梓桐山賦」，現在祇剩下保存在《玉篇》裏的這兩個字。<sup>9</sup> 顧愷之的「湘中賦」既然還有四個字保存於今，如與司馬相如的「梓桐山賦」相較，它保存下來的字數，還不算是最少的。

由嚴可均所搜集到的顧愷之的佚文，儘管在長度上，大致都很短，可是在形式上，這十六篇卻分屬於賦、詩、表、牋、序、贊、傳，和祭文等八種不同的文體。根據這一點，可以看出顧愷之既然能用多種不同的文體寫作，他的寫作能力是很強的。顧愷之的佚文既然分屬八種不同的文體，這就牽涉到一個問題，也就是到顧愷之的時代為止，中國的文章，共有多少種文體的問題。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似乎有四種資料值得參考。時代最早的資料，可能是三國時代的魏文帝曹丕（卒於黃初七年，即蜀漢後帝建興四年，227）所寫的《典論》。他在《典論》的《論文》裏，說過這樣的幾句話：<sup>10</sup>

「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傳、賦欲麗。」

<sup>9</sup> 見何沛雄：《略論漢書所載錄的辭賦》，載《新亞學報》，卷十五，頁二〇一～二二八。

<sup>10</sup> 見嚴可均：《全三國文》，卷八，頁一〇～一一。

儘管也許還有別的文體，曹丕並沒提到，不過至少以曹丕的《論文》為根據，到西元三世紀初年為止，中國的文體，已有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等八種。

第二種資料是文人陸機（261-303）的著名《文賦》。在《文賦》裏，他對於中國的文體，提出下面所引的這一段話：<sup>11</sup>

「詩緣情而綺麗、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悽愴、箴頓挫而清壯，頌優游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奏平徹以閑雅、說煒燁而譎誑。」

在這一段引文裏，陸機所提到的文體，共有傳、賦、碑、誄、箴、頌、論、奏、和說等八種。把他所提出的八種與由曹丕所提出的八種互相比較，可以看出奏、論、銘、誄、傳、賦這六種，是兩人都提到的。祇由曹丕提出的，是議、和書等兩種。祇由陸機提出的，是碑、箴、頌、說等四種。把由曹丕提出的兩種、陸機提出的四種、與曹、陸兩人都提到的那六種相加，中國的文體，至少有十二種。不過這個數字還不能算是到西晉末年為止的中國的文體的總數。因為死於晉懷帝永嘉時代（307-312）的摯虞，<sup>12</sup> 其卒年雖較陸機稍遲，但大致可以視為與陸機同時。摯虞曾經寫過一部篇幅本有三十卷的《文章流別志論》，<sup>13</sup> 來討論文章的源流和類別。可惜這項資料早已失傳了。此書現殘存在的一千五百字，<sup>14</sup> 恐怕在摯虞的原著裏，所佔的比例是很輕微的。在殘存的《文章流別志論》裏，摯虞不但討論了頌、傳、七辭、賦、箴、銘、誄、哀辭、文、圖籀、和碑銘等十一種文體，又在討論頌的時候，說了這樣的幾句話：

「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英終而誄集。祝史陳辭，官箴王闕。」

在這段引文裏，他提到的文體，共有詩、頌、銘、誄、祝、和箴等六種。對於頌、

11 見《陸平原集》（據明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民國十四年，上海，掃葉山房印行），卷一，頁一一二，又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九十七，頁一～二。

12 見《晉書》，卷五一，頁一四一九～一四二五，《摯虞傳》。

13 見同12。

14 見《摯太常集》（據《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不分卷本，頁一二～一四，又見《關中叢書》本，民國七年，戊午，陝西通志館印，卷三，頁一一五），又見嚴可均《全晉文》，卷七十七，頁七～八。

詩、銘、誄、箴等五種，他是分別有所討論的，只有祝，才是在殘存的《文章流別志論》中未經討論的一種文體。如果把祝與已被討論過的十一種相加，由摯虞所提出的文體總數應該是十二種。不過在這十二種之中，有四種（銘、誄、傳、詩）是曹丕和陸機都已提過的，另外又有三種（箴、頌、碑）是陸機個別提過的。把這七種除去，只有七辭、哀辭、解嘲、圖箴、和祝這五種，才是曹、陸兩家都沒提到過的文體。前面說過，在西晉末年，到陸機時代為止，中國文體的總數是十二種。如果把這十二種與由摯虞所提出的那五種相加，在西晉末年，摯到虞去世之際，也即到四世紀的一〇年代為止，以陸機與摯虞的著錄為根據，中國文體的總數，似乎應該是十七種。

第四種資料是在東晉中期，由當時的文人李充所寫的《翰林論》。李充在這種著作之中，提出了書、議、讚、表、駁、論、盟、檄、詩等九種文體。<sup>15</sup> 在這九種之中，書和議是曹丕早已提過的、論是陸機早已提過的，而詩又是曹、陸、摯三家早都提過的。如果把這五種除去，只有駁、盟、檄這三種文體，才是曹、陸、摯三家都沒有提過的。如果把這五種與前面提到的十七種相加，到東晉中期為止，中國文體的總數，以曹、陸、摯、李四家的著錄為依據，應該是二十二種了。為了便於觀察，現在就把已在上面分析過的，四種資料裏的各種文體，列成一個表，附在下頁。

表裏特別要注意的是《翰林論》的作者李充。據《晉書》裏的《李充傳》，<sup>16</sup> 他曾在王導（267-330）擔任丞相的時候，先在丞相府裏擔任掾，後來才轉任記室參軍。等到褚裒擔任征北將軍，他又擔任褚裒的參軍。據《晉書》卷七《成帝紀》，<sup>17</sup> 王導是在成帝咸康四年（338）六月擔任丞相的。再據《晉書》卷九十三《褚裒傳》，<sup>18</sup> 褚裒是在晉穆帝永和六年（350），因為征伐石季龍失敗，而由征討大都督的職位上，自貶為征北將軍的。所以李充擔任丞相掾與征北將軍之參軍的時間的上限，既不得早於338年，也不能早於350年。儘管李充的卒年不詳，不過他一生最重要的時代，可能

15 按嚴可均《全晉文》卷五十三，雖收李充《翰林論》的佚文八條，但與文體無關。本文現用的資料，是根據舒衷正「文心雕龍與蕭選分體之比較研究」一文而轉引的。舒文見王更生編《文心雕龍研究論文選粹》（民國六十九年，臺北，育民出版社出版），頁三九四～四三七。

16 見《隋書》，卷九二，頁二三八八～二三九一。

17 見同上，卷七，頁一八一。

18 見同上，卷九十三，頁二四一七。

到東晉中期為止的中國文體表

| 文體名稱<br>文體種類 | 提出人與<br>共著作 | 曹 丕<br>《典論》<br>〈論文〉 | 陸 機<br>《文賦》 | 摯 虞<br>《文章流別論》 | 李 充<br>《翰林論》 |
|--------------|-------------|---------------------|-------------|----------------|--------------|
| 1. 奏         |             | 奏                   | 奏           |                |              |
| 2. 議         |             | 議                   |             |                | 議            |
| 3. 書         |             | 書                   |             |                | 書            |
| 4. 論         |             | 論                   | 論           |                | 論            |
| 5. 銘         |             | 銘                   | 銘           | 銘              |              |
| 6. 誄         |             | 誄                   | 誄           | 誄              |              |
| 7. 詩         |             | 詩                   | 詩           | 詩              | 詩            |
| 8. 賦         |             | 賦                   | 賦           | 賦              |              |
| 9. 碑         |             |                     | 碑           | 碑銘             |              |
| 10. 箴        |             |                     | 箴           | 箴              |              |
| 11. 頌        |             |                     | 頌           | 頌              |              |
| 12. 說        |             |                     | 說           |                |              |
| 13. 七辭       |             |                     |             | 七辭             |              |
| 14. 哀辭       |             |                     |             | 哀辭             |              |
| 15. 文        |             |                     |             | 文              |              |
| 16. 圖讖       |             |                     |             | 圖讖             |              |
| 17. 祝        |             |                     |             | 祝              |              |
| 18. 贊        |             |                     |             |                | 贊            |
| 19. 表        |             |                     |             |                | 表            |
| 20. 駁        |             |                     |             |                | 駁            |
| 21. 盟        |             |                     |             |                | 盟            |
| 22. 檄        |             |                     |             |                | 檄            |

就是在 338 與 350 年之間的這十二年以內。《翰林論》的成書時代固然也不詳，不過也不妨假設爲他在 338 與 350 之間寫成的著作。用最保守的方式來說，《翰林論》至少也應該是四世紀中期的著作。顧愷之在 344 年出生的時候，李充的《翰林論》剛剛寫成六年。顧愷之在 405 年去世時，也不過只在《翰林論》寫成以後五十五年。

從李充寫成《翰林論》，到顧愷之去世的這五十五年之中，再沒有別人在他的著作裏，對於中國的文體，提出新的種類。所以根據表一，可以看出到李充的時代爲止（事實上，也就等於到顧愷之的時代爲止），中國的文章的種類的總數，以從曹丕到李充的那四種資料爲準，一共是奏、議、書、論、銘、誄、詩、賦、碑（碑銘）、箴、頌、說、七辭、哀辭、文、圖籙、祝、讚、表、駁、盟、檄等二十二種。在這二十二種文體之中，與顧愷之的著作有關的，是詩、賦、表、贊、文等五種。也就是說，這五種，在到晉代末年爲止，而已有著錄的二十二種文體之中所佔的比例，是百分之四十。此外，他還能寫序和賡，而這兩種文體，更已超出那曾被記錄的二十二種之外。所以根據以上的資料和對這些資料的分析，顧愷之的寫作能力是相當強的；他既能寫作從戰國時代開始的賦、也能寫作在晉代新興的賡和序。

關於顧愷之的寫作能力，也許還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加以觀察。前面提過的《文賦》之作者陸機的文學作品的總集是《陸平原集》。在此集中共有賦、表、書、七、論、議、頌、箴、碑、誄、哀辭，和詩等十二種文體，是與上列的文體表中所錄的各種文體有關的。在西晉時代，比陸機的時代還早的傅咸（239-294），也是一位能夠寫作多種文體的文人。在他的《傅中丞集》裏，共有賦、表、奏、書、頌、箴、銘、碑銘、誄、和詩等十種文體，是與上列的文體表裏所錄的各種文體有關的。由此兩例，可見傅咸能夠寫作的文體，佔文體表中所錄的文體之百分之五十，而陸機能夠寫作的文體，就文體表裏所錄的二十二種而言，也幾乎佔了百分之五十。這兩種比例，都比顧愷之能寫作的文體，只佔文體表裏所錄的文體之百分之四十的百分比率，要高出百分之十。可是傅咸與陸機都不是畫家。顧愷之既是畫家，而他能夠寫作的文體，又有八種之多，這就更顯得顧愷之在寫作方面的能力非常強。總之，顧愷之能夠用八種不同的文體寫作，似乎要經過與傅咸和陸機的寫作能力加以比較，才顯得更有意義。

## 二、張彥遠搜輯的論畫文字

由嚴可均所搜輯到的，顧愷之的十六篇佚文，大部份都是文學作品，此外，還有一小部分（譬如傳和祭文），可以說是應用文。可是除了文學作品與應用文，顧愷之還寫過一些專門討論藝術的文章，而這些文章，卻是嚴可均完全沒有注意的。顧愷之的論藝文字，現知共有三篇

一、魏晉勝流畫贊

二、論畫

三、畫雲臺山記

這三篇文章，是當張彥遠在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寫成《歷代名畫記》的時候，就由他編入卷五，附在《顧愷之傳》的後面，而得以保存的。《魏晉勝流畫贊》共分十九條，《論畫》也分十九條。《畫雲臺山記》，全長四百六十餘字，不分條。在由嚴可均所搜輯到的十六篇佚文之中，有一篇，文題是《王衍畫贊》。所謂王衍（255-311），就是著名的「竹林七賢」裏的王戎的從弟，<sup>19</sup>而王戎（234-305）正是東晉時代的名士。<sup>20</sup>看來《王衍畫贊》與《魏晉勝流畫贊》的內容和性質，也許正好可說是相同的。在另一方面，張彥遠既然早已指出顧愷之的這三篇論畫的文章，《自古相傳，脫簡》，可見由他收進《魏晉勝流畫贊》裏的那十九條，可能未必就是這篇文章的全文。在這種情況之下，由嚴可均所搜輯到的《王衍畫贊》，也許原來就是由張彥遠所搜輯到的《魏晉勝流畫贊》裏的一部份。根據這個推論，《王衍畫贊》可以重新收入《魏晉勝流畫贊》。那麼，由嚴可均所搜輯到的顧愷之在文學方面的佚文的總數，就要由十六篇減少到十五篇。可是，由張彥遠所紀錄的顧愷之的論畫文字之中，那篇《魏晉勝流畫贊》的內容，就要由於《王衍畫贊》的重新劃入，而要由十九條增加為二十條了。

總之，關於顧愷之的已失傳的《通直散騎常侍顧愷之集》，現在能夠見到的資料，大概就是這麼多。他在純文學與應用文方面的作品，共有十五篇。這十五篇的重現，要多謝嚴可均在清末多年的苦心搜輯。至於顧愷之在論畫方面的作品，共有三篇。這三篇，是遠在唐代就由張彥遠加以著錄的。可惜嚴可均在搜輯顧愷之的佚文的時候，對於張彥遠的著作，完全沒有注意到。所以這三篇論畫文字，又成為嚴可均的

19 見同上，卷四十三，頁一二三五～一二三八，《王戎傳》所附《王衍傳》。

20 見同上，卷四十三，頁一二三〇～一二三四，《王衍傳》。

《全晉文》的佚文。

### 三、部份復原後顧愷之集的目錄

分析過顧愷之的論藝文字的內容與性質，可以把由嚴可均所搜輯到的顧愷之的文學創作方面的文章，與由張彥遠搜輯到的論藝文章，集合在一起。這樣，顧愷之的佚文的數目，就可由於十五篇一般性文章與三篇論藝文章的總和，而成爲十八篇。跟着，似乎就可以根據由嚴可均與張彥遠所搜輯到的顧愷之的佚文，和由《隋書》之《經籍志》對顧愷之的文集的卷數的紀載，而把已經失傳的《顧愷之集》，加以部份的復原了。經過復原後的《顧愷之集》的目錄，也許可以暫時釐定如下：

晉通直散騎常侍顧愷之集

#### 卷一 賦

雷電賦（見附錄一）

觀濤賦（見附錄二）

冰 賦（見附錄三）

湘中賦（見附錄四）

湘川賦（見附錄五）

箏 賦（見附錄六）

鳳 賦（見附錄七）

#### 卷二 詩

四時詩（見附錄八）

#### 卷三 表

拜員外郎散騎常侍表（見附錄九）

#### 卷四 序

虎丘山序（見附錄一〇）

嵇康贊序（見附錄一一）

#### 卷五 贊

魏晉勝流畫贊（見附錄一二）

水贊（見附錄一三）

卷六 牋

與殷仲堪牋（見附錄一四）

傳

父悅傳（見附錄一五）

祭文

祭牙文（見附錄一六）

卷七 畫論

論畫（見附錄一七）

畫雲臺山記（見附錄一八）

## 貳、啟 矇 記

### 一、關於啟蒙記的討論

#### 1. 啟蒙記就是啟矇記

《晉書》在《顧愷之傳》裏，雖然把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記爲《啟矇記》，可是對於這部書的卷數，《晉書》是沒有記載的。然而《隋書》的《經籍志》，卻不但把此書的書名記成《啟蒙記》，更清楚的標明它的篇幅是三卷。<sup>21</sup>《晉書》是房喬奉唐太宗之命而修纂的；修成於貞觀二〇年（646）。《隋書》是魏徵等人奉唐太宗而修纂的；修成於貞觀十年（636）。《隋書》與《晉書》雖然都修成於唐代初年或第七世紀的前期，但是這兩部史書對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記載，即使對卷數的紀錄的有無，暫時不加討論，就以書名而言，在紀錄上，也已有「啟蒙」與「啟矇」的差異。

《三國志》的《魏志》卷三《明帝紀》，在青龍三年三月庚寅條下，有「葬文德郭后，營陵於首陽澗西，如終制」之句。此句之下有一段雙行小字的注文，其文云：<sup>22</sup>

21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頁九四二。

22 見《三國志》之《魏志》卷三，「明帝紀」（據民國五十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縮印「百衲本」），頁四二五五。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苦泣，一年餘而死。

注文的來源是顧愷之的《啟蒙注》。魏青龍三年(235)，雖比顧愷之的時代(344-405，也即從第四世紀的中期到第五世紀的前六年)，早了一百五十多年，不過《三國志》是在劉宋的元嘉六年(429)，由裴松之(372-451)對陳壽(233-299)的原文，在增加了注文，又得到宋文帝的承認之後，才能公開流傳的。裴松之完成《三國志》的注文之年(429)，上距顧愷之下世之年(405)，不過二十五年。所以裴松之與顧愷之大致可以算是同時代的人物。裴松之引用顧愷之的著作去為陳壽的《三國志》作注，從時間上看，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再就現代史學家在史學方法方面所講求的原始資料的觀點而言，<sup>23</sup>他所引用的《啟蒙注》，如與《晉書》所記的《啟蒙記》，或《隋書》所記的《啟蒙記》相較，也不能不說是第一手的原始資料。可是無論如何，《啟蒙注》、《啟蒙記》、與《啟蒙記》等三名，各有一個字的差別。這樣，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到唐代初年為止，共有三種不同的書名了。

《隋書》雖把《晉書》所記載的《啟蒙記》記為《啟蒙記》，但在此書之外，據《隋書》的記載，顧愷之還有一種叫做《啟疑記》的著作。<sup>24</sup>更容易引起混亂的是《啟疑記》的篇幅，也是三卷，和《啟蒙記》的篇幅相較，正好是一樣的。《隋書》既把《啟疑記》與《啟蒙記》隔行並列，而且又把這兩種著作都列在顧愷之的名下，可見在唐代初年或第七世紀前期，當魏徵等人奉詔修纂《隋書》的時候，顧愷之的《啟疑記》和《啟蒙記》，應該都還存在。因此，《啟疑記》與《啟蒙記》，可能並不是書名有一字之誤的同一部書，而是書名有一字之別的兩部書。如果《啟蒙注》、《啟蒙記》，和《啟蒙記》與《啟疑記》無關，那麼，列在顧愷之名下的，以啟蒙或啟疑二字為名的著作，前後共有《啟蒙記》、《啟蒙記》、《啟蒙注》、與《啟疑記》等四部書了。

23 近代史學家在史學方法上，最重視史料的來源。姚從吾在《歷史方法論》裏（見《姚從吾先生全集》民國六十四年，臺灣，正中書局出版），對這個觀點有多方面的討論。

24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一，頁九四二。又見同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三。

除了這四部書，晉代的文人束皙，寫過一部叫做《發蒙記》的書。<sup>25</sup> 這部書的書名，與據說作者都是顧愷之的《啟蒙記》、《啟矇記》、和《啟蒙注》，特別是與《啟蒙記》，看來是非常接近的。其實所謂「蒙」，本是《易經》裏的一個卦名。卦象是坎在下，艮在上，代表微昧與闇弱的意思。在字義方面，昧就是闇，而闇就是隱晦。所以蒙的卦象所代表的意義，是物象的隱晦、暗淡、與微弱。簡易的說，就是物象不明。把這個意義加以延伸，或者可以把看不清楚的物象，或者看不清楚的空間，視為一個渾沌重濁的世界。而這個世界，如果用求知來作譬喻，也就是在沒有得到正確的啟發之前，那種茫然無知的階段的象徵。在求知的進行之中，需要正確的導引和啟發，正像世間要有充沛的陽光，才能夠照徹隱晦和暗淡的陰霾。在這個觀念之下，發蒙與啟蒙，都具有打開大蒙的意義。換句話說，用訓詁的觀點來看，發蒙與啟蒙的意義，大致是互通的。至於啟疑，可以說是對已經具有相當知識的人，在既已產生疑問而又不得其解的時候，所給予的啟發或導引。也即是說，需要啟疑的人的知識水準，高於需要啟蒙的人。啟疑雖然不等於啟蒙，不過二者所具有的啟發性的導引功能，在性質上，是一樣的。從這個觀點來看，啟蒙與啟疑的意義，即使並不互通，至少可說是相當接近的。因此，《啟蒙記》和《發蒙記》以及《啟疑記》的性質和內容，似乎也可以根據這個推論，而假定它們有若干相近的地方。

再說，這三部書既然都以「記」字作為書名的最後一字，也許由裴松之在《三國志》的《魏志》裏所引用的《啟蒙注》，就是《啟蒙記》。《啟蒙注》的產生，是由於把「記」字誤寫或誤刻為「注」字。假如實況的確如此，《晉書》的《顧愷之傳》把《啟蒙記》寫成《啟矇記》，大概是書寫上的，或者是版刻上的另一種錯誤。這是本文對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之可能性的第一種假設。

## 2. 啟蒙注不是啟蒙記

可是如果把觀察的角度加以轉變，可以看出，晉代有不少文人，都喜歡用「注」字作為他們的著作之書名的最末一字。譬如說，在歷史方面，崔豹既編寫過《古今注》，<sup>26</sup>

25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二，《經籍志》一，頁九四二。

26 見《隋書》卷三十四，《經籍志》三，頁一〇〇七，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三，頁九（前頁）。

伏無忌也編寫過《古今注》。<sup>27</sup>在輿服方面，徐廣(352-425)編寫過《車服雜注》。<sup>28</sup>此外，在別的方面，摯虞編寫過《決疑要注》。<sup>29</sup>稍後，在南北朝時代，以「注」字作為著作之名的最末一字的風氣，仍舊很盛行。譬如郭璞(276-324)既編寫了《山海經注》，又編寫《水經注》。<sup>30</sup>在南朝，郭演編寫過《職令古今百官注》、<sup>31</sup>明山賓編寫過《梁吉禮儀注》、<sup>32</sup>賀瑒(452-510)編寫過《梁賓禮儀注》、<sup>33</sup>何胤(446-531)編寫過《政禮儀注》。<sup>34</sup>此外，從東漢時代開始，當時已有若干專門為紀錄天子的生活情形而編寫成書的《起居注》。<sup>35</sup>這種書，在晉代，是也有不少文人從事編寫的。

27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五九。

28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〇。據百衲本《宋書》卷五十五的《徐廣傳》（此據民國五十六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縮印本。原書以吳興劉氏嘉業堂所藏宋蜀大字本為主，所缺各卷，以上海涵芬樓所藏元、明遞修本補配），他所編寫的，是《軍服儀注》而不是《車服儀注》。今標點本《宋書》（一九七四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卷五十五，頁一五四八，特別在《徐廣傳》傳文的「義熙初，高祖使撰《軍服儀注》」一句之下，增加小注，並在注文中說，「車服，各本作軍服，據《晉書》、《南史》廣傳、《建康實錄》、《元龜》五六日改。」可見《宋書》在《徐廣傳》中把《車服儀注》記成《軍服儀注》，是錯誤的。清末丁國鈞作《補晉書藝文志》（據光緒十七年，1891，廣州廣雅書局所刻《廣雅叢書》本），他在此書卷二，頁七，根據蕭統《文選》卷三所收漢人張衡「東京賦」賦文裏的注文，以及《宋書》卷八《禮志》五裏的正文，而指出徐廣所編寫的是《車服儀注》而不是《軍服儀注》。可惜標點本《宋書》在為上引徐廣傳的那句傳文作注的時候，沒能利用到由丁國鈞所提到的文獻，而指出《軍服儀注》應為《車服儀注》之誤。

29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〇。不過《晉書》卷五十一的《摯虞傳》，對於摯虞的著作，只紀錄了《文章志》、《注解三輔決錄》，和《文章流別集》等三種。對於他的《決疑要注》是沒有記載的。這個情形，與《晉書》在《顧愷之體》裏，只記錄了他的《顧愷之集》和《啟矇記》，但忽略了他的《晉文章記》的存在，真可說是如出一轍。由這個例子，也可看出來房喬雖然奉詔編修《晉書》，事實上，他對晉代的文獻是並不熟悉的。

30 《晉書》卷四十二有《郭璞傳》。其《山海經注》，據《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二，共二十三卷，但據《舊唐書》卷二六，《經籍志》上，頁二〇一四，共十八卷，再據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七（後頁），十八卷的來源是由於劉秀校定之篇數共十八篇而來。至於郭璞的《水經注》卷三，見《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二。

31 見前揭標點本《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九六八。

32 見同，頁九六九。

33 見同 32，頁九七〇。

34 見同 32，頁九七〇。

35 據李宗侗：《中國史學史》（民國四十二年，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頁七四，起居注的開始，約在東漢時代。《隋書》卷三五《經籍志》二，頁九六四，著錄了沒有撰人姓名的《漢文帝起居注》卷五。這是曾經史家著的錄過的，時代最早起居注。

到唐代，雖然有許多在晉代編寫的《起居注》，連編者的姓名已經失傳了，<sup>36</sup>不過至少由李軌編寫的幾種；譬如《晉泰始起居注》、《晉咸寧起居注》、《晉泰康起居注》，和《晉咸和起居注》，<sup>37</sup>在魏徵等人編寫《隋書》的時候，也即在貞觀十年（636）左右，還是存在的。

根據以上所提出的這些資料，在晉代，既有《起居注》，和《古今注》，也有《車服注》，和《決疑要注》。晉人編寫《起居注》，固然或者可說是由漢代開始的《起居注》之寫作傳統的延續，可是崔豹與伏無忌編寫《古今注》，採取以筆記式的寫作形式來記述掌故和歷史，以及徐廣編寫《車服雜注》，為的是要討論一種專用的服裝，這幾種書，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在性質上，都與專門記載皇帝的個人生活之生活細節的《起居注》，完全不是一回事。其中最有趣，同時也許也是最重要的是摯虞的《決疑要注》。根據張鵬一的輯本來看，<sup>38</sup>這部書的內容，大致是對各種禮節的討論。<sup>39</sup>這樣說，晉代文人既然常以「注」字作為書名，而且摯虞又曾經編寫《決疑要注》，顧愷之在晉代末年曾有一部書名是《啟疑注》的著作，應該是甚有可能的。也即從書名上看，顧愷之的《啟疑記》，可能與摯虞的《決疑要注》，在若干程度上，是接近的。根據這個推論，顧愷之的《啟疑注》，或者也像摯虞的《決疑要注》一樣，是一種討論禮節的書。但是由裴松之引用在《三國志》的《魏志》裏的《啟蒙

36 據《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三的「起居注篇」（頁九六四～九六五），不知撰人姓名而成書於晉代的《起居注》，共有《晉元康起居注》、《晉建武，大興，永昌起居注》、《晉咸康起居注》、《晉建元起居注》、《晉永和起居注》、《晉升平起居注》、《晉隆和，興寧起居注》、《晉泰和起居注》、《晉寧康起居注》、《晉泰元起居注》、《晉隆安起居注》、《晉元興起居注》、《晉義熙起居注》、與《晉元熙起居注》等十餘種。

37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起居注篇」，頁九六四。

38 民國二十四年陝西通考館所印《關中叢書》，放有《摯太常遺書》卷三。此書第一卷，即張溥收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裏的《摯太常集》。卷二為《決疑要注》，這是由張鵬年根據《北堂書鈔》等書之引文而集得的輯佚本。張鵬年又在此卷之前，附有《決疑要注序》，序末有戊午十二月的年疑。按戊午為民國七年（1918）。可見這個輯佚本，不但可補張溥的《摯太常集》之缺，而且也為《摯太常遺書》的復原，提供很重要的資料。

39 據張鵬一所輯《摯太常遺書》卷二，《決疑要注》的內容，共十條，現錄名條名目如下：  
（1）禘、（2）廟主、（3）昭穆、（4）救日蝕、（5）朝會、（6）殿陛、堂階、（7）讌會、（8）袞冕、（9）旒頭、（10）博士弟子、（11）太常弟子、（12）玉佩、（13）故君齊衰、（14）弔祭同姓、異姓、（15）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為服儀、（16）天子帳。

注》(已見頁 461, 不再引), 卻是對於一個從周代的王冢裏發現的陪葬女子的事蹟的紀錄。這種文字, 在性質上, 與禮節的討論, 是毫無關係的。因此, 裴松之引用過的《啟蒙注》, 可能原來就叫《啟蒙注》, 也即是說, 《啟蒙注》或者並不會是《啟蒙記》的誤寫。這是對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之可能性的第二種假設。

### 3. 啟蒙——新問題的出現

根據以上的討論, 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 固然可以採取與束皙的《發蒙記》相類似的方式, 而命名為《啟蒙記》。在另一方面, 也未嘗不可因為晉人著書喜以「注」字作為書名之末字的風氣, 而命名為《啟蒙注》。所以顧愷之的這部著作, 究竟應該按照晉人裴松之的紀錄稱為《啟蒙注》, 還是應該按照唐人魏徵, 與房喬的紀錄而稱為《啟蒙記》, 似乎一時還難於遽加斷語。

在這種情況之下, 也許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問題, 不妨從版本和校勘兩方面去尋求解答。可是在版本上, 無論是北宋大字本的《三國志》,<sup>40</sup> 還是南宋高宗紹興時代(1131-1162)的小字本《三國志》,<sup>41</sup> 甚至宋代所刻的小字本《晉書》,<sup>42</sup> 以及元代成宗大德時代(1297-1307)所刻的《隋書》,<sup>43</sup> 既沒把裴松之所引用的《啟蒙注》, 刻成《啟蒙記》, 也沒把由房喬和魏徵在《晉書》和《隋書》中所紀錄的《啟蒙記》, 刻成《啟蒙注》。換言之, 在版本上, 顧愷之的這種著作的書名, 是沒有答案的。那麼, 在校勘方面, 這部書的書名問題, 是不是可以找到答案呢?

大體上, 在校勘方面, 似乎應該根據文獻的時代的先後, 而分成清代的校勘, 與現代的校勘等兩部份。要解決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問題, 可以從這兩部份裏面去分頭考察。先看清代的校勘。清光緒十八年(1892, 壬辰), 丁國鈞寫成《晉書校文》五卷。<sup>44</sup> 此書卷四, 收集了丁國鈞對《晉書》的七種傳記的校文(這七種傳記,

40 原書藏吳興劉氏嘉業堂。民國十七年(1926, 戊辰)印行。但未注明發行地點與出版者。

41 上海商務館於中日之戰以前, 曾發行百衲本二十四史。《三國志》之《蜀志》與《吳志》, 借日本帝室圖書寮所藏南宋光宗紹興時代(1190-1194)之刊本。《魏志》三卷, 以該館所藏南宋高宗紹興時代(1131-1162)之刊本配補。

42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晉書》, 以海寧蔣氏衍芳草堂所藏宋本為主。此本所缺的《載記》部分, 共三十卷, 用江蘇省之國學圖書館所藏的宋本配補。

43 百衲本二十四史之《隋書》, 以元成宗大德時代(1297-1307)的刻本為底本而影印。

44 《晉書校文》雖寫成於光緒壬辰, 但至光緒二十年(1894, 甲午), 方由錫山文苑閣以活字排版印行。民國六年(1917, 丁巳), 此書改稱《晉書校識》, 並增繆荃孫序, 刻版印行。

依次爲卷八十八《孝友傳》、卷八十九《忠義傳》、卷九十一《儒林傳》、卷九十二《文苑傳》、卷九十三《外戚傳》、卷九十四《隱逸傳》、與卷九十五《藝術傳》)。在《晉書》中，顧愷之的傳記雖然收在《文苑傳》裏，可是丁國鈞對於《文苑傳》，祇對趙至、裴據、李充，和袁宏等四人的傳記，作了有限的校勘。對於《文苑傳》裏的《顧愷之傳》，丁國鈞是連片言隻字的校勘工作也沒作過的。除了丁國鈞的《晉書校文》，在清同治七年（1868），吳士鑑與劉承幹二人合著《晉書斟注》，共一〇〇卷。其書卷九十二就是對《晉書》卷九十二《文苑傳》的校注。可是在《晉書斟注》卷九十二，吳、劉兩家在《顧愷之傳》中，對於《啟蒙記》的書名問題，祇在這部著作的書名之下，附加了這麼一條小注：「隋志小學類作《啟蒙記》三卷。兩唐書無記字。《魏志·明帝記》注引作《啟蒙注》」。<sup>45</sup> 根據這段注文裏的第一句話，《啟蒙記》與《啟蒙注》似乎應該是同一部書。這個意見與本文前所提出的第一種假設相同。再根據這段注的第三句話，《啟蒙記》可能就是《啟蒙注》。他們的這個意見，又與本文前所提出的第二種假設，不謀而合。除此以外，還有兩種不知完成於那一年的《晉書校勘記》，也應該在此提及。第一種是由勞格（1820-1864）作的，第二種是由周家祿作的。勞格的《晉書校勘記》，因爲是個殘本，所以在未殘之前，是否對《文苑傳》曾加校勘，現不可知。但在現存的殘本裏，既然沒有《文苑傳》，所以當然沒有對於《顧愷之傳》的校勘。<sup>46</sup> 至於周家祿的《晉書校勘記》，雖然在卷四部份，收錄了對於《文苑傳》的校勘，可是他所校勘的，只是應貞、趙至、曹毗、與伏滔等四人的傳記。對於《顧愷之傳》，他並沒作校勘。<sup>47</sup> 換言之，對於如何解決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而言，清代學者對《晉書》所作的校勘工作，無論是丁國鈞的、是吳士鑑與劉承幹合作的，還是勞格的、或者周家祿的，可說都沒有用。

這樣，跟下來，就要再看現代的史學校勘了。可是在這方面，在由顧頡剛主持而

45 見《晉書斟注》，卷九十二，頁四十八。

46 勞格的《晉書校勘記》，收在《叢書集成》的初編（民國二十五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全書共三卷。根據此書在書名下的註文，「原本缺首尾」，可見現存的三卷本是個殘存本。

47 周家祿的《晉書校勘記》，共五卷，也收在前註所舉的《叢書集成》初編之中。他對《晉書》的《文苑傳》的校勘，見於此書頁四，卷八九～九〇。

集體完成的標點本二十五史之中，既沒有把《啟蒙記》和《啟蒙注》視為同一部書，也并未把《啟蒙注》和《啟蒙記》視為同一部書。<sup>48</sup> 因此，《啟蒙記》也許可以假設為《啟蒙記》的誤寫或誤刻。這麼說，《啟蒙記》與《啟蒙注》究竟應該是一部書，還是兩部書，無論是從版本的、還是從校勘的立場來看，依然是沒有答案的難題。何況在《新唐書》裏，顧愷之的這部著作既然只被稱為《啟蒙》，<sup>49</sup> 也即在「啟蒙」二字之下，是既沒有「記」字也沒有「注」字的。《新唐書》是由歐陽修（1007-1072）等人在從宋仁宗慶曆四年到嘉祐五年（1044-1060）之間修成的。儘管在編寫方面，《新唐書》備受後代史家之好評，<sup>50</sup> 可是此書對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之書名的處理方式，卻是不敢恭維的。也許遠在十一世紀的中期，歐陽修等人已經看出來《啟蒙記》與《啟蒙注》的正確書名的選擇，是無法解決的問題，索性省去書名的第三個字，而把它直接稱為《啟蒙》了。假如《啟蒙記》與《啟蒙注》本來真是一部書的兩種名稱，為了避免書名的混亂，而把它們略稱為《啟蒙》，也許情有可原。反過來說，假如《啟蒙記》與《啟蒙注》本非同一部書，歐陽修等人只是為了避免它們在書名上的糾纏不清，而把它們略稱為《啟蒙》，那就等於把兩部書混為一部書，也就等於在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之書名，究竟應該稱為《啟蒙記》，還是應該稱為《啟蒙注》的老問題還沒得到解決之前，又引起了一個新的問題。

#### 4. 馬國翰的輯佚本啟蒙記

在清末，山東學者馬國翰，曾經費了很大的精力，從許多不同的文獻之中去搜集資料，而把五百多種久已失傳的書，還原了一部分。在同治十年（1871），由濟南的皇發館書局所刻印的，共有六百多卷的《玉函山房輯佚書》，代表他在輯佚舊書方面的努力與成績。馬國翰因為發現在晉代裴松之的《魏志注》、唐初虞世南（558-638）的《北堂書鈔》、和徐堅（659-729）的《初學記》、以及宋初李昉（925-996）的《太

48 《啟蒙記》見標點本《晉書》卷九十二，《顧愷之傳》，頁二四〇六。《啟蒙注》見標點本《隋書》卷三十一，《經籍志》一，頁九四二。《啟蒙注》見標點本《三國志》之《魏志》卷三，頁一〇四。

49 見標點本《新唐書》（一九七五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卷四十七，《藝文志》一，頁一四四九。

50 按李宗侗：《中國史學史》（民國四十二年，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出版），頁八十八，讀此書云：「史官皆特選之才，史料又較豐富，足以憑籍，故能文省事增。」

平廣記》等四部書中，都保存了《啟蒙記》的若干片斷。他就根據這些片斷而輯成《啟蒙記》；書凡一卷，共十條（見附錄一九）。馬國翰既把他對顧愷之的佚文的輯本稱為《啟蒙記》，可見對歐陽修等人把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只稱為《啟蒙》，而不稱為《啟蒙紀》或《啟蒙注》的，那種不敢負責的態度，是並不贊成的。

前面說過，由裴松之加於《三國志》之《魏志》裏的注文的來源，是顧愷之的《啟蒙記》。可是馬國翰在輯佚本的《啟蒙記》裏，把保存在《魏志》裏的《啟蒙注》的文字，也編進去了。馬國翰何以要這樣做，在他的《玉函山房輯佚書》裏，是並沒有解釋的。不過據推想，他必是把《啟蒙注》認為與《啟蒙記》是同一部書，才把《啟蒙注》裏的顧愷之的佚文，編入輯佚本的顧愷之《啟蒙記》裏去的。如果這個推測無誤，也許在馬國翰的心目中，顧愷之並沒有《啟蒙注》。裴松之所引用的《啟蒙注》，大概是《啟蒙記》的誤寫或誤刻。至於把《啟蒙記》記成《啟蒙記》，或者只是書寫上或版刻上的錯誤，因為《易經》裏的「蒙」，是從不寫成「矇」的。所以把《啟蒙記》寫成《啟蒙記》，雖然對於顧愷之的第二部著作，曾經引起一點混雜，問題是不難解決的。此外，馬國翰既然在他的輯佚本《啟蒙記》裏，對於曾經也認為是出於顧愷之手筆的《啟疑記》一字不提，也許在他的心目中，《顧疑啟》是不存在的。

如果這兩個推測無誤，對於顧愷之的著作而言，馬國翰與編修《晉書》的房喬一樣，也認為顧愷之的著作只有兩種；一種是《顧愷之集》、另一種就是《啟蒙記》了。這樣，馬國翰在《玉函山房輯佚書》之中，把顧愷之的已失傳的第二種著作稱為《啟蒙記》，而不稱為《啟蒙紀》或《啟蒙注》，事實上，他已對顧愷之這種著作的書名，作了一個結論。也即是說，根據馬國翰對《啟蒙記》這個書名的使用，他必認為顧愷之既沒有《啟疑記》，也沒有《啟蒙注》。還有，他必也認為《啟蒙記》既不能改稱《啟矇記》，也不能略稱為《啟蒙》。這是對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之可能性的第三種假設。

##### 5. 啟矇記的性質

未佚的《啟蒙記》的內容，究竟是什麼，現在雖然難以明瞭，不過此書既以啟蒙二字為名，據推想，書裏的文字，既該富於啟發性，而文字的內容，或者也會偏重於

人生哲學的討論。可是如對輯佚本《啟蒙記》裏的那十條文字稍加觀察（見附錄一九），可以看出它們的內容，不是對於山川的描寫，<sup>51</sup> 就是對於風物的記載。<sup>52</sup> 易言之，從馬國翰輯佚本的《啟蒙記》裏，看不出這部書與人生哲學有什麼關係。儘管如此，也許關於《啟蒙記》的內容，還可從另一個層面加以觀察。易言之，根據這十條佚文的內容與《啟蒙記》的書名，也許可以假設未佚的《啟蒙記》，在內容上，至少可分為兩部份；討論人生哲學的那部份，是富於啟發性的，而記載各地實況的另一部份，卻是富於描述性的。根據這個假設，此書既以《啟蒙記》為名，討論人生哲學的那一部份，也許在篇幅上，大於描述性的另一部份。不過由馬國翰所搜集到的那十條，由於正好屬於描述性的那部份，所以都是沒有啟發性的，所以也才會與人生哲學的討論，毫不相關。難怪馬國翰要在輯佚本《啟蒙記》的序言裏說，由他輯到的十條佚文，並不是原書的「訓蒙之正體」。<sup>53</sup> 看來在馬國翰的心目中，顧愷之的《啟蒙記》應該是偏重人生哲學之討論的。

從另一個角度上再加觀察，馬國翰的這個看法，似乎並不能說是完全正確的。如前述，在訓詁上，啟蒙與發蒙的意義是可以互通的。因此，《啟蒙記》的第一部份，也即討論人生哲學的那一部份的內容，與《發蒙記》的內容（假定《發蒙記》的內容，完全以人生哲學的討論為主），也應該是非常接近的。《發蒙記》雖已佚傳，可是它的內容，並非完全不可知。譬如根據《隋書》的記載，<sup>54</sup> 《發蒙記》「載物之異」。這一句話，雖然可說是語焉不詳，不過至少卻可根據這一句綱領式的介紹，而知道《發蒙記》的主要內容，是對於各地風物的描述。這種內容，與在輯佚本的顧愷之《啟蒙記》中所保存的那十條佚文的內容，是相同的。發蒙既與啟蒙互通，但《發蒙記》並不討論人生哲學。所以《啟蒙記》在未佚之前，可能和《發蒙記》一樣，也以描述各地的風物為主。這樣說，《啟蒙記》並不是一部討論人生哲學的書。

51 在輯佚本的《啟蒙記》中，與山川有關的，計有「潛穴洞」、「汎林」、「天臺石橋」、「將雨」、與「馬鞍山」等五條。

52 在輯佚本的《啟蒙記》中，與風物有關的，計有「然鼠石」、「石鷺」、「玉精」、「隨刀改味」、與「周王冢」等五條。

53 見《玉函山房輯佚書》（據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第四十九冊《啟蒙記》序。

54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三。

前面提過，所謂「蒙」，本是《易經》裏的一個卦名。蒙的意義是微昧與闇弱。啟蒙的意義是脫離昏暗。如果根據卦象的指導而使人離開困境，或者脫離生活上的昏暗，也就等於是得到了光明。由於這些意義，在中國文獻之中，「啟蒙」這個名詞的使用，至少在時間上，從南宋開始，似乎常與《易經》有關。在書名上，最早使用這兩個字，而內容又與《易經》研究有關的著作，是朱熹（1130-1200）的《易學啟蒙》。<sup>55</sup> 跟着，稅與權又寫了一部與《易經》研究有關的事；書名也叫《易學啟蒙》。<sup>56</sup> 此外，胡方平也寫過一本《易經》方面的書；書名是《易學啟蒙通釋》<sup>57</sup>。到這時候，把「啟蒙」兩字與《易經》相提並述，似乎已經形成一種傳統。所以，在元代，胡一桂所寫的與《易經》有關的著作叫做《周易啟蒙翼傳》，<sup>58</sup> 而在明代，韓邦奇（1479-1555）所寫的與《易經》有關的著作叫做《啟蒙意見》。<sup>59</sup> 顧愷之雖然是《啟蒙記》的作者，不過，歷代的文獻從未提到過他對《易經》的研究。因此，他的《啟蒙記》，如果要與上面列舉的幾種既以「啟蒙」為名，又與《易經》研究有關的著作去比較，恐怕在性質上，是很不相同的。這就是說，顧愷之的《啟蒙記》，應該不會是一種討論《易經》的著作。

根據上面的分析，《啟蒙記》不是討論人生哲學的著作。現在又知道它也不是討論《易經》的書。那麼，這部著作的性質究竟是什麼呢？《晉書》在《顧愷之傳》裏，是把《啟蒙記》記成《啟矇記》的。也許要了解顧愷之的這種著作的性質，要從「啟矇」這兩個字來着手。所謂「矇」，在字義上，大致有兩種解釋：第一種意義是看不清楚，<sup>60</sup> 第二種是完全看不見。<sup>61</sup> 如果眼睛有病，在病況比較輕的情況之下，是會看不清楚的，如果病沉重，甚至會完全看不見，變成盲人。但是在一般情況之下，如果眼睛真的看不見，也即得了盲病，很少會用「矇」字去形容。根據這樣的了解，

55 朱熹《易學啟蒙》，現有清康熙時代中興兒呂氏實語堂刊本。

56 稅與權《易學啟蒙》卷一，見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十九冊。

57 胡方平《易學啟蒙通釋》卷二，見同上書，第二十冊。

58 胡一桂《周易啟蒙翼傳》卷四，見同上書，第二十二冊。

59 韓邦奇《啟蒙意見》卷四，見同上書，第三十冊。

60 按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於豐部解矇字云：「不明也。」

61 按《釋名》之「釋疾」條云：「矇，有眸子而失明。」又《廣雅》釋詁三，「矇，盲也。」

矇字雖有三義，卻以第一種意義（看不清楚）最普通。不過，顧愷之在《啟矇記》裏的「啟矇」二字，似乎在字義上，所採取的，不是第一種意義，而是第二種意義。也即是說，顧愷之使用「啟等」二字，有一種使盲人也看得見的意思。用現代的俗語來解釋，他使用這兩個字，有一種使人大開眼界的意思。這項推論，不是不可以證明的。要證明《啟蒙記》具有使人大開眼界的意思，最主要的證據，當然是它的內容。如果《啟矇記》所記載的事物，的確是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在看過這部著作之後，豈不於是項開了眼界？也豈不等於是讓瞎子看見了事物？或者用顧愷之自己的字彙來說，豈不是等於讓人「啟」了「矇」？根據這項推論，可以了解本文雖然對於顧愷之這種著作的書名，究竟應該是什麼，列舉了三種可能性，其實這些可能，都不能符合顧愷之的原意。只有把它稱為《啟矇記》，才能符合顧愷之的原義。《晉書》卷九十二在《顧愷之傳》裏說，顧愷之「好諧謔」。意思是說顧愷之的為人，具有幽默感，也愛和人開玩笑。顧愷之把他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稱爲《啟矇記》，恐怕除了具有幽默感，也有一點和人開玩笑的意思在內吧。

《啟矇記》裏，有什麼事物可以讓人開眼界呢？譬如在「汎林」這一條，顧愷之說，海裏不但有一片樹林，樹林的面積更可大到有三百方里。這些樹的根，可以隨着波浪的一高一下，而上下飄動。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他在「石鸞」這一條，又說，在湖南的零陵，有一種石塊，其形如燕。每逢風雨，石燕就可以飛，飛得好像是真的燕子一樣。石燕會飛，這不也是足以使人大開眼界的怪事嗎？《啟矇記》原來的篇幅既有三卷，可見顧愷之對於各地的奇異的事物的搜集，必定曾經煞費苦心的。也許顧愷之是爲了要使一般人能夠多知道一些各地的奇異的事物，等於讓一個盲人可以突然看到他自己身處的世界，才把這部著作定名爲《啟矇記》的吧。根據這個觀點，關於顧愷之的第二種著作的書名問題，現在似乎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說，顧愷之專門記載各地奇異風物的著作的書名，應該是《啟矇記》而不是《啟蒙記》。《啟蒙記》應該是《啟矇記》的誤寫。《啟蒙》可能又是《啟蒙記》的漏寫。至於《啟蒙注》，大概是由於裴松之引《啟蒙記》爲《魏志》作注，又由後人把《啟蒙記》誤寫爲《啟蒙注》的。

如果這項推論可以肯定，馬國翰由於《啟蒙記》裏的十條佚文，完全是對於各地

的山川的記載與風物的紀錄，而認為此書「非訓蒙之正體」的看法，就需要加以糾正了。因為他既不知道《啟蒙記》應該是《啟矇記》的誤寫（也就是說，他對顧愷之的佚文所給予的書名，是錯誤的），也不知道因為《啟矇記》是一部專門記載各地的奇異風物的著作，所以在這部書裏，根本就沒有他所強調的「訓蒙之正體」。<sup>62</sup> 總之，馬國翰對於顧愷之的《啟矇記》的佚文的搜求雖勤，可是他對於這種著作的性質與內容，似乎從來就沒有了解過。

#### 6. 顧愷之何以會寫啟矇記

現在可以進入對《啟矇記》的討論的最後一項，也就是要找出顧愷之何以要寫這部書的原因。關於這一點，似乎可從兩個層面來分別討論。從小的層面方面觀察，顧愷之寫作《啟矇記》，是由於他個人的，對於各地風物的興趣。但從大的層面方面觀察，他寫《啟矇記》，似乎與晉代一般文人所喜好的，專門紀錄各地風物、或靈怪之物的寫作風氣有關。也即是，顧愷之寫《啟矇記》，與當代新興的寫作方向是緊密相關的。現在先看小層面，也即是他個人的興趣。據《晉書》卷九十二《顧愷之傳》，他因為擔任荊州刺史殷仲堪的參軍，經常住在湖北。有一次，他請假到浙江去。當他從浙江回到荊州以後，要人問他浙江會稽的山川是什麼樣子，他的答語是：「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蒙籠，若雲興霞蔚。」<sup>63</sup> 再據此傳的另一段記載，有一次，顧愷之又因事請假，離開了荊州。他走前，殷仲堪把自己的布帆借給他。當顧愷之的船航行到一個叫做破冢的地方，忽然吹起了大風，把他的船吹翻了。這時，顧愷之趕緊給殷仲堪寫一封信，信文說：「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sup>64</sup> 由頭一段記載，可以看出顧愷之是一個既喜歡遊山玩水，又能夠描寫山水之美的人。但由第二段記載，似乎又可看出顧愷之喜歡用文字來描述他在旅途中的見聞。顧愷之既喜歡遊覽，又喜歡用文字描述見聞，他如果遇見像石燕會飛、或者海上樹林的面積會長達三百里這一類的奇異事物，怎麼會不加以記載？由這些事實和假設，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他寫作《啟矇記》的部份原因，是由於他在旅遊方面的興趣，以及他

62 見《晉書》卷九十二，《顧愷之傳》，頁二四〇四。

63 見同 62。

64 見同 62。

在文學創作方面，描寫山水的興趣。

在大層面方面，晉代的文人，在寫作方面，似乎很喜歡對各地的，尤其是對長江流域的，或者西南地區的人物與山川，以及奇異的事物加以記載與描述。譬如在這兩方面，當然干寶的《搜神記》、<sup>65</sup> 托名陶潛的《搜神後記》、<sup>66</sup> 王嘉的《拾遺記》、<sup>67</sup> 和張華的《博物志》，<sup>68</sup> 都是有名的著作，此外，還有沈瑩的《臨海水土異物志》、<sup>69</sup> 續咸的《異物志》、<sup>70</sup> 譙周的《異物志》、<sup>71</sup> 薛瑩的《荊揚以南異物志》、<sup>72</sup> 以及嵇含的《南方草木狀》。<sup>73</sup> 在南方人物方面，范瑗寫過《交州先賢傳》、<sup>74</sup> 張方寫過《楚國先賢傳》、<sup>75</sup> 習鑿齒寫過《襄陽耆舊記》、<sup>76</sup> 常寬寫過《續益部耆舊傳》。<sup>77</sup> 至於

- 65 按《晉書》卷八十二有《干寶傳》。傳文說他有感於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卷三十。」此書至宋已佚，現在可看到的《搜神記》，只有二十卷，可能是明代胡元瑞從《法苑珠林》等類書中輯錄而成的。標點本《搜神記》共二六二頁，一九七九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66 《搜神後記》是一部侈談鬼神，稱道靈異的「志怪」小說。在唐宋類書中，又引作《續搜神記》或《搜神續記》。書共十卷，舊題晉陶潛撰。陶潛即陶淵明，是一位超脫放達的詩人。他會寫作這種「拳拳於鬼神」的作品，的確令人生疑。譬如張心激的《偽書通考》卷下（民國六十二年，臺灣，鼎文書局重版），頁二一七，就把這部書列為偽書。不過根據余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考出此書題作陶潛所撰，「自梁已然，遠在《隋志》之前。」可見此書即使是一部偽書，其撰成時代也離陶潛的時候，不會太遠。標點本《搜神後記》由汪紹楹校注，一九八一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67 《晉書》卷九十五有《王嘉傳》。其書共十卷，前九卷起庖犧迄東晉，末卷則記崑崙山等九座仙山。《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列入雜史類。見標點本，頁九六一。
- 68 《晉書》卷六有《張華傳》。張華的《博物志》現有范寧的校證標點本，一九八〇年，北京，中華書局出版。
- 69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頁九八四。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七。
- 70 《晉書》卷六十一有《續咸傳》。此傳亦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八。
- 71 見蕭統《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注。
- 72 見蕭統《文選》卷五，左思《吳都賦》注。
- 73 《晉書》卷五十九，《嵇紹傳》後，附有《嵇含傳》。此書初見《文獻通考》。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九。
- 74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四，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二二（前頁）。
- 75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四，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二二（後頁）。
- 76 《晉書》卷五十二有《習鑿齒傳》。此書首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五，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二二（後頁）。
- 77 此書首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四。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二十二（前後頁）。《隋書》雖然著錄此書，但未載撰者姓名。丁國鈞在《補晉書藝文志》裏，曾經根據常璩的《華陽國志》而考出此書的作者應該是常寬。北京中華書局在標點本《隋書》之中，雖對書中各卷都附有「校勘記」，但對此書，並無校勘。忽視了丁國鈞的考證，是很可惜的事。

山川方面，虞預寫過《會稽典錄》、<sup>78</sup> 周處寫過《陽羨風土記》、<sup>79</sup> 顧夷寫過《吳郡記》、<sup>80</sup> 賀循也寫過《會稽記》。<sup>81</sup> 顧愷之記載石燕會飛、和海上有樹林，在性質上，這一類文字與張華在《博物志》中所記異鳥用火燒石蟹、<sup>82</sup> 和有些山上的竹子，高達千仞，<sup>83</sup> 那一類的記載，已經十分相近。至於顧愷之記載從周王冢中所發現的女子，還能再活十年的事，也與干寶在《搜神記》中所記載的，漢昭帝打開鉤戈夫人的冢，棺空無人，只存絲履的故事，也有幾分相似。本文舉出顧愷之的《啟矇記》與張華的《博物志》和干寶的《搜神記》有點類似，並無意說顧愷之寫作《啟矇記》，必定受到張華與干寶的影響。可是在顧愷之的時代之前，晉代的文人既已產生那麼多描寫山川、或紀錄各地風物的著作，大概顧愷之的《啟矇記》，就是在這種新興的寫作風氣之下，又配合了他喜好山川的興趣與描寫山川的能力，而完成的。總之，根據以上的分析，顧愷之的寫作興趣很廣，寫作能力也很強。就是他的論畫文字不予計算，至少，他的《顧愷之集》與《啟矇記》，不但性質不同，內容也不同，完全代表兩種不同的典型。

除了《顧愷之集》、《啟矇記》、和三篇畫論，顧愷之還有一種著作。不過關於這種著作，由於目前只能看到殘存的一句話，可以討論的地方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本文只能把對於顧愷之這種著作的簡單的討論，附在對《顧愷之集》與《啟矇記》的討論之後，而不另闢一節。

根據晉人劉義慶(365-427)的《世說新語》，<sup>84</sup> 顧愷之的這種著作是叫做《晉文

78 《晉書》卷五十二有《虞預傳》。據《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七四，此書二十四卷。據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二十三（後頁），此書作二十篇。今未見此書，不知此書的篇幅，究竟為何。

79 《晉書》卷二十八有《周處傳》。此書首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三。

80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二，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十六（前頁）。

81 《晉書》卷三十八有《賀循傳》。此書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二，頁九八三，又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三七六（前後）。

82 見註 62 所引范寧校證標點本《博物志》卷三，頁三七。

83 見同 62，卷三，頁三九。

84 見《世說新語》卷四，《文學篇》。據楊勇《世說新語校箋》（一九六九，香港大眾書局出版），此卷共收一〇四條。劉義慶所引顧愷之《晉文章記》見《文學篇》第六十七條（魏朝封晉文王爲公），頁一九三。

章記》的。不過就在唐代初年，當房喬編修《晉書》的時候，對於顧愷之的著作，除了《顧愷之集》和《啟矇記》，他並未提過顧愷之還有別的著作。同時在《晉書》裏，也沒有類似《漢書》的《藝文志》或《隋書》的《經籍志》那種專門記載當代的圖書與文獻的篇章。這兩件事，似乎可以說明，當房喬在唐代初年編修《晉書》的時候，他似乎並不知道顧愷之還有一種叫做《晉文章記》的著作。不但如此，就像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這種重要的著作，在《晉書》之中，也照樣是沒有紀錄的。

然而與《晉書》幾乎同時編修的《隋書》，對於《世說新語》卻是有所紀錄的。<sup>85</sup>《隋書》紀錄《世說新語》，採用什麼版本，現在無法可知。不過至少有一種唐人手寫本的《世說新語》，<sup>86</sup>目前是依然可見的。房喬既對顧愷之的《晉文章記》和劉義慶的《世說新語》都沒有紀錄，證明他對晉代的圖書文獻，並不很熟悉。直到民國九年（1920），丁國鈞為《晉書》補編《藝文志》，才根據劉義慶的《世說新語》，而把顧愷之的《晉文章記》，列在《補晉書藝文志》裏。<sup>87</sup>房喬在七世紀初期所造成的，對《晉文章記》不加紀錄的錯誤，一直要到二十世紀的初期，也即在《晉書》修成一千三百多年之後，才在丁國鈞的著作之中，得到更正。

根據目錄學的立場，從西晉初期，或三世紀中期開始，產生了一種專門記載文人傳記與其著作的書。這種書，當時稱為《文章志》。最早的《文章志》，共四卷，是由晉代初年的摯虞編寫的。<sup>88</sup>此後，時代比顧愷之稍晚的傅亮（卒於 426），又編寫過《續文章志》，共兩卷。<sup>89</sup>晉代之後，南朝的宋明帝（465-475），又編寫過《晉江左文章志》，也是兩卷。<sup>90</sup>從文獻上看，與晉代的目錄學有關的著作，共有四部。從時間上看，由摯虞、顧愷之、和傅亮所編的，都完成於晉代，只有由宋明帝所編的那

85 見《隋書》卷二十九，《經籍志》三，小說家類，頁一〇一一。

86 見嚴一萍編：《晉唐真賞十四種》（民國六十四年，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第二冊，頁一～四二。

87 見丁國鈞《補晉書藝文志》，卷二，頁四一（前頁）。

88 見《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九九一。又見百衲本《晉書》，卷五一，《摯虞傳》頁一二（後頁），縮印百衲本《晉書》，頁五三二一。

89 見《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九九一。但在《宋書》卷四三的《傅亮傳》裏，對這部《續文章志》，並沒有記錄。

90 見《隋書》，卷三十三，《經籍志》，頁九九一。

一部，是在晉代亡國之後才編輯成書的。顧愷之這部記載文人傳記與其著作的書，雖然在書名上，稱為《晉文章記》，看來似乎與摯虞的《文章志》、傅亮的《續文章志》、以及宋明帝的《晉江左文章志》，並不相同，不過從晉代到南朝，與文人傳記及其著作有關的書，是都叫做《文章志》，而沒有叫做《文章記》的。顧愷之的這部書，既稱《晉文章記》而不稱《晉文章志》，也許又是一個像把《啟蒙記》誤寫或誤刻為《啟蒙注》那樣的問題吧。

摯虞除了編寫過最早的《文章志》，又編寫了前面引用過的《文章流別志論》。<sup>91</sup>這兩部書，現在都還有若干篇幅可見。可是顧愷之的《晉文章記》，除了在《世說新語》裏所保存的短短的幾句話（見附錄二〇），可說已經完全佚失了。饒宗頤認為這部書或者與《隋書》所錄的張隱《文士傳》一樣，是一種文人記傳之書。<sup>92</sup>不過張隱的《文士傳》，現亦不存。顧愷之的《晉文章記》的性質，是否真與張隱的《文士傳》一樣，是難以比較的。

### 叁、結 語

關於顧愷之的著作，現知共有三種。《晉書》在《顧愷之傳》中認為顧愷之的著作，只有兩種，是不負責的話。

他的第一種著作，也就是《顧愷之集》，現在已經根據嚴可均所搜集的十六篇文章，再加以部份的復原。復原的方法，是在資料方面，依賴嚴可均、在文集的卷數方面，根據《晉書》在《顧愷之傳》裏的記載。至於用來復原《顧愷之集》的文章順序的先後，則以韻文（詩、賦）為先，其他文體的無韻之文為次。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雖然保存了顧愷之的三篇畫論，可是在北宋以前，並沒有專門討論繪畫藝術的書。根據這個理由，現在把顧愷之的這三篇畫論，也編在得到部份復原的《顧愷之集》裏，作為全書的最後一卷。

他的第二種著作，也就是《啟蒙記》，根據本文的討論，可能是一部專門記載各地之奇異事物的事。書以「啟蒙」為名，也許具有讓人大開眼界的意思。原書共三

<sup>91</sup> 見注13。

<sup>92</sup> 見饒宗頤「六朝文論摭佚」，載《大陸雜誌》（民國五十一年，臺北），第十五卷，第三期。

卷，現在除了見於附錄一九的那十條，可說已經散佚不存了。

他的第三種著作，也就是《晉文章記》，可能是一部抒論晉代文章之風格或典型的書，內容近似文學批評。這部書，除了見於附錄二〇的那一條，也可說已完全亡佚了。

總之，根據這三部書，可以看出來，顧愷之的寫作能力既強，興趣也很廣。所以他才能寫幾種性質與內容完全不一樣的書。《晉書》在《顧愷之傳》裏，除了稱讚他「博學有才氣」，又認為他是一位「才絕、畫絕、癡絕」的人物。<sup>93</sup>所謂「博學」或「才絕」，大概就指這位名士，既能畫、又能兼擅文學創作、文學批評、藝術批評、與風物描述的事實而言。顧愷之在文學方面；能夠同時從事於創作與評論的發展，興趣與能力都是多元的。<sup>94</sup>他在藝術方面，既能完成《女史箴圖》、《洛神賦圖》等等畫蹟，又能撰寫《論畫》、《魏晉勝流畫贊》、以及《畫雲臺山記》等論畫文字，興趣與能力也是多元的。易言之，他在文學與藝術方面，不但同時從事多元化的發展，發展的方式也是一致的。看不出顧愷之在文學與藝術兩方面的多元式的發展，恐怕對於這位在東晉末年之名士的個性的了解，還是不夠深入的，也是缺乏全面性的。

## 肆、附 錄

### 附錄一 雷電賦

太極紛綸，元氣澄練。陰陽相薄，爲雷爲電。擊武乙于河，而誅戮之罰明。震展

93 見《晉書》，卷五十一，頁二四〇四，二四〇六。

94 見百衲本《晉書》卷五十一，頁一二（後頁），又縮印百衲本，頁五三二一。

顧愷之所畫的《女史箴圖》，是根據張華所寫的《女史箴》（原文見蕭統《文選》卷五十六）而完成的一卷畫。張華在此箴中，採用儒家的人文思想，訂立條規，而對宮女的生活行為，有很大的限制。顧愷之既然根據《女史箴》作畫，可見他對張華的想法是贊同的。也即是說，顧愷之對於儒家的思想，是贊同的。可是除了《女史箴圖》，顧愷之又曾根據曹植的《洛神賦》而畫成《洛神賦圖》卷。曹植在此賦之中，發揮想像力，極盡浪漫之能事。顧愷之既然畫過《洛神賦圖》卷，可見他對曹植的浪漫思想，也很感興趣。這兩卷畫的繪製，不啻說明在思想上，顧愷之是既尊重儒家的傳統，又熱衷於對魏晉時代新興的浪漫思潮的追求。此外，他的「畫雲臺山記」，雖然是對表現了張天師之事蹟的畫面的文字紀錄，但由這篇文字的寫作來看，他對道教的神仙觀，也是相當傾心的。由《女史箴圖》、《洛神圖》、與「畫雲臺山記」的思想背景來看，可見在繪畫方面，顧愷之的思想是傾向於多元性的。這種傾向，如果與他在文學寫作方面的興趣互相比較，正好是一致的。

氏之廟，而隱隱之誅見。是以宣尼，敬威忽變。夫其聲無定響，光不恆照。砰訇輪轉，倏閃藏曜。若乃太陰下淪，少陽初升。蟄蟲將啟，動靈先應。殷殷徐振，不激不憑。林鍾統節，溽暑烟燼。星月不朗，衣裳若焚。爾乃清風前颭，蕩濁流塵。豐隆破響，列缺開雲。當時倦容，廓焉精新。豈直驚安竦寐，乃以暢精悟神。天怒將淩，赤電先發。窺巖四照，映流雙絕。雷電赫以驚衡，山海磕其奔裂。若夫子午相乘，水旱木零。仲冬奮發，伏雷先行。磕磕隆隆，閃閃復復。二語從《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二補豈隱隱之虛憑，乃違和而傷生。昭王度之失節，見二儀之幽情。至乃辰開日朗，太清無靄。靈眼揚精以麗煥，壯鼓崩天而砰磕。陵雉匍匐以待傾，方地嶮嶮其若敗。蒼生非悟而喪魂，龍鬼失據以顛沛。光驚於泉底，聲動於天外。及其灑北斗以誕聖，震昆陽以伐違。降枝鹿以命桀，島雙潰而橫尸。倒驚檜於霄際，摧騰龍於雲湄。烈大地以繞映，惟六合以動威。在靈德而卷舒，謝神豔之難迫。《藝文類聚》二、《初學記》一、《太平御覽》一三。

## 附錄二 觀濤賦

臨浙江以北眷，壯滄海之宏流。水無涯而合岸，山孤映而若浮。既藏珍而納景，且激波而揚濤。其中則有珊瑚明月，石帆瑤瑛。彫鱗采介，特種奇名。崩巒填壑，傾堆漸隅。岑有積螺，嶺有懸魚。謨茲濤之爲體，亦崇廣而宏浚，形無常而參神。斯必來以知信，勢剛凌以周威，質柔弱以協順。《藝文類聚》九。

## 附錄三 冰 賦

激厲風而貞質，仰和景而融暉。清流離之光徹，逸雲英之巍巍。爾乃連綿絡幕，乍結乍無。翕然靈化，得漸已僊。緗白隨川，方圓隨渠。義剛有折，照壺則虛。託形超象，比朗玄珠。一宗理而常全，經百合而彌切。轉若驚電，照若澄月。積如累空，泮若墮節。臨堅投輕，應變縷裂。瓊碎星流，清練流越。若乃上結薄映，下鏡長泉。靈葩隨流，含馨揚鮮。《藝文類聚》九、《初學記》七。

## 附錄四 湘中賦

陽駕山雞。《太平御覽》九一八。

#### 附錄五 湘川賦

其表則有滋澤晨潤，彫霜夜凝。《北堂書鈔》一五二。

#### 附錄六 箏 賦

其器也，則端方修直，天隆地平。華文素質。爛蔚波成。君子喜其斌麗，知音偉其含清。罄虛中以揚德，正律度而儀形。良工加妙，輕縟璘形。玄漆絨響，慶雲被身。《藝文類聚》四十四、《初學記》一六。

#### 附錄七 鳳 賦

望太清以抗思，誕儀鳳之逸羣。稟鶉火之靈曜，資和氣之煙燼。允雞喙而燕頤，頸蛇蛻而龍文。勵歸昌於漢陽，發明□乎聖君。荷義蹕正，雞峙鴻前。比翼交揮，五色備宣。與八風而降時雨，音中鍾律，步則規矩。朱冠赫以雙翹，靈質翮其高舉。歲黃冠於招搖，陵帝居之懸圃。《藝文類聚》九十九、《初學記》三〇。

#### 附錄八 四時詩

春水滿四澤，夏雲多奇峯，秋月揚明輝，冬嶺秀孤松。《淵鑑類函》歲時部之一

#### 附錄九 拜員外郎散騎常侍表

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之貂璫之暉。《北堂書鈔》五十八。

#### 附錄一〇 虎丘山序

吳城西北，有虎丘山者，含真藏古，體虛窮玄。隱鱗陵堆之中，望形不出常阜。至乃岳嶽，絕於華峯。《藝文類聚》八。

#### 附錄一一 嵇康贊序

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寧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靚曰：「叔夜迹示終而實尸解。」《文選》五君詠注

## 附錄一二 魏晉勝流畫贊

凡畫人最難。次山水、次狗馬、臺榭一定器耳。難成而易好，不待遷想妙得也。此以巧歷不能差其品也。小列女：面如恨，刻削爲容儀。不盡生氣。又插置丈夫支體，不以自然。然服章與眾物既甚奇，作女子尤麗衣髻。俯仰中，一點一盡，皆相與成其艷姿。且尊卑貴賤之形，覺然易了。難可遠過之也。周本記：重疊彌綸有骨法，然人形不如小列女也。伏羲神農：雖不似今世人，有奇骨而兼美好。神屬冥芒，居然得有一之想。漢本記：季王首也，有天骨而少細美。至於龍顏一像，超豁高雄，覽之若面也。孫武：大荀首也，骨趣甚奇。二婕以憐美之禮，有驚劇之則。若以臨見妙裁，尋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醉客：作人形。骨成而制衣服慢之，亦以助醉神耳。多有骨俱，然生變趣，佳作者矣。穰苴：類孫武而不如。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列士：有骨俱。然藺生恨急烈，不似英賢之慨。以求古人，未之見也。於秦王之對荆卿，及復大閑。凡此類，雖美而不盡善也。三馬：雋骨天奇，其騰罩如躡虛空。於馬勢盡善也。東王公：如小吳神靈。居然爲神靈之器，不似世中生人也。七佛及夏殷與大列女：二皆衛協手傳，而有情勢。北風詩：亦衛手。巧密於精思，名作。然未離南中。南中像興，卽形布施之象，轉不可同年而語矣。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迹、世所並貴。神儀在心，而手稱其目者，玄賞則不待喻。不然真絕。夫人心之達，不可或以眾論。執偏見以擬通者，亦必貴觀於明識。末學詳此，思過半矣。清遊池：不見金鎬，作山形勢者，見龍虎雜獸，雖不極體，以爲舉勢。變動多方。七賢：唯嵇生一像欲佳。其餘雖不妙合，以比前諸竹林之畫，莫能及者。嵇輕車詩：作嘯人，似人嘯。然容悴，不似中散。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陳太丘二方：太丘夷素，似古賢，二方爲爾耳。嵇興：如其人。臨深履薄：兢戰之形，異佳有裁。自七賢以來，並戴手也。——巖巖清峙，壁立千仞。晉書王衍傳。

## 附錄一三 水 贊

湛湛若凝，開神以質。乘風擅瀾，妙齊得一。 《藝文類聚》八。

#### 附錄一四 與殷仲堪牋

地名破冢，真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晉書》九十二  
《顧愷之傳》。

#### 附錄一五 父悅傳

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柏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世說新語》  
言語篇注。

#### 附錄一六 祭牙文

維某年某月日，錄尚書事豫章公裕。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兩儀有政，四海有王。晉命在天，世德重光。烈烈高牙，闐闐伐鼓。白氣經天，簡揚神武。《藝文類聚》  
六〇、《太平御覽》三  
三九。

#### 附錄一七 論 畫

凡將摹者，皆當先尋此要。而後次以即事。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可令新迹掩本迹，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迹，各以全其想。

譬如畫山，迹利則想動。傷其所以疑。用筆或好婉，則於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於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

寫自頸已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於諸像，則像各異迹，皆令新迹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

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於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人有長短，今既定遠近，

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

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 附錄一八 畫雲臺山記

山有面，則背向有影。可令慶雲西而吐於東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盡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暎日。西去山，別詳其遠近。發迹東基，轉上未半，作紫石如堅雲者五六枚。夾岡乘其間而上，使勢蜿蜒如龍。因抱峯直頓而上，下作積岡，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次復一峯是石，東鄰向者峙峭峯。西連西向之丹崖，下據絕磴。畫丹崖臨澗上。當使赫礚隆崇，畫險絕之勢。天師坐其上，合所坐石及蔭，宜磴中，桃傍生石間。畫天師瘦形而神氣遠。據磴指桃，迴面謂弟子。弟子中有二人臨下，到身大怖，流汗失色。作王良，穆然坐答問。而趙昇神率精詣，俯眄桃樹。又別作王趙趨，一人隱西壁傾巖，餘見衣裾。一人全見。室中使輕妙冷然。凡畫人，坐時可七分。衣服彩色殊鮮微。此正蓋山高而人遠耳。

中段：東面丹砂絕萼及蔭，當使嵒巖高驪，孤松植其上。對天師所壁以成磴，磴可甚相近。相近者，欲令雙壁之內，悽愴澄清。神明之居，必有與立焉。可於次峯頭，作一紫石亭立。以象左闕之夾高驪絕萼，西通雲臺以表路。路左闕峯，以巖爲根。根下空絕，并諸石重勢。巖相承以合，臨東磴。其西，石泉又見。乃因絕際作通岡，伏流潛降，小復東出。下磴爲石瀨，淪沒於淵。所以一西一東而下者，欲使自然爲圖。雲臺西北二面可一圖岡繞之。上爲雙碣石，象左右闕。石上作孤遊生鳳，當婆娑體儀，羽秀而詳。軒尾翼以眺絕磴。

後一段：赤圻。當使釋弁如裂電。對雲臺西鳳所臨壁以成磴，磴下有清流。其側壁外面，作一白虎，匍石飲水，後爲降勢而絕。凡三段山，畫之雖長，當使畫甚促。不爾不稱。鳥獸中時有用之者，可定其儀而用之。下爲磴。物景皆倒，作清氣。帶山下三分偃一以上。使耿然成二重。已上並長康所著。因載于篇。自古相傳脫錯，未得妙本勘校。

附錄一九 啟矚記

潛穴洞於波下。虞世南《北堂書鈔》

汎林鼓於浪巔。

西北海有汎林，或方三百里，或方百里。皆生海中浮土上。樹根隨浪鼓動。《太平御覽》卷五〇

臯塗有然鼠之石。《北堂書鈔》

天台石橋。記句佚  
據注補

天台山去天不遠，路經福溪，依《文選》注當作油溪溪水清冷。前有石橋。路逕不盈一尺，長數十丈。下臨絕冥之澗。唯忘其身，然後能躋。躋石橋者，梯巖壁，捫蘿葛之莖，度得平路。見天台山，蔚然綺秀。列雙嶺依《文選》注當作雙關於青霄上。有瓊樓、玉閣、天堂、碧林、醴泉，仙物畢具。晉隱士帛道猷得過之；獲醴泉、紫芝、靈藥。

《太平御覽》卷四十一引《蒙記》注、又引《蒙記》曰：天台山石橋，路徑不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與《文選》卷十一孫興公《天台山賦》李善注引《蒙記》注同，而與前引文小異。又

《文選》注引云：天台次經油溪。又云：躋石橋者，搏巖壁，捫蘿葛之莖。又云：天台山，列雙關於青霄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物畢具。字句亦互有不同。

零陵郡有石鸞，得風雨，則飛如真鸞。徐堅《初學記》五、《太平御覽》卷五十一、《吳淑事類賦》卷七。

玉精名委，似美女而青衣。見以桃戟刺之，以其名呼之可得也。《太平御覽》卷三五三。

如何隨刀而改味。《太平御覽》卷九六一。

魏時，人有開周王冢者，得殉葬女子。經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語。年可二十，送詣京師，郭太后愛養之。十餘年，太后崩，哀思哭泣，一年餘而死。《魏志明帝紀》裴松之注

將雨雲應。

婁仁有馬鞍山，南面有石穴，高丈餘，容十數人。天將雨，輒有雲從南來，山亦出雲應之，即大雨。《北堂書鈔》卷一五八。

附錄二〇 晉文章記

阮籍勸進，落落有宏致，至轉說徐而攝之也。《世說新語》文學篇。